

中国如何攀升全球价值链

——兼评《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实现机制与战略调整》

张二震

内容提要 当前,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面对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中国亟待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发展高水平开放型经济。国内学者从培养高级要素、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及构建国内价值链等角度,对中国如何攀升全球价值链进行了有益探讨。新阶段攀升全球价值链的总体战略和思路,应符合中国发展的实际和开放型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在顺应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新趋势的基础上,形成新思路、新对策。

关键词 全球价值链 新常态 国际分工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形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突出表现为产品的价值链被分解了,国与国之间的优势更多地表现为产业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生产阶段和环节的优势,从而导致国与国之间按同一产业或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或工序进行分工,学术界把这种新的国际分工形式称为全球价值链分工,其实质是“要素分工”,即各国以本国的要素优势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实现生产的国际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开放发展的伟大实践,就是融入全球价值链,不断实现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过程,所取得的开放成就举世瞩目。但长期以来“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传统粗放式发展道路,也带来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上述问题愈发凸显,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亟待提高。近年来,围绕这一重大现实课题,国内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南京审计大学青年学者戴翔教授的新著《中国攀升全球价值

链:实现机制与战略调整》(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以下简称《机制与战略》),就新形势下中国如何攀升全球价值链,进行了深层次的理论探讨,对中国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的战略与机制,提出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观点和建议,值得肯定和关注。

价值链攀升应符合中国发展所处现实阶段

中国开放型经济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国际市场需求持续低迷,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更多具有低成本优势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全球竞争,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竞争日趋激烈;国内各种生产要素价格集中进入上升期、资源能源和环境约束日益严峻、经济增速放缓等,这些都构成了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多重倒逼压力。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攀升价值链的迫切性,更要冷静分析中国攀升价值链的现实条件和基础,不可操之过急。中国多年来开放发展形成的产业体系,有其特定发展阶段的合理性。价值链攀升也并非一朝一夕之功,不

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必须遵从一定的经济发展规律。我们知道,比较优势并非静态的、一成不变的,会随着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发生变化。诸如人口数量的改变、人口结构的变化、资本要素的积累、技术进步、要素的跨境流动等,都会在增量和存量意义上改变一国或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进而表现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比较优势的结构性变化,这种变化是有一定规律性的。国外学者在研究产品空间动态转换中发现^①,从出口产品结构变化角度看,出口企业更容易向距离较近的新产品方向转变,这是因为出口产品作为一国或地区的要素禀赋结构载体,邻近产品在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等要素投入方面显然更为接近和相似。换言之,动态比较优势的变化往往具有关联性和渐进性,即未来一定时期一国或地区的出口商品结构究竟具有怎样的转换潜力和发展方向,与现有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出口商品结构高度相关。

那么,中国如何攀升全球价值链呢?很多学者强调,我们应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实现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转变,即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比较优势和低端代工,向以技术、品牌和服务等价值链高端全面升级。从长期看,这当然是有道理的,实践中也不乏成功升级的案例。但是,就当前(短期)而言,总体来说,基于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现实需要的战略调整 and 对策举措,必须建立在现有比较优势的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准确判断和定位未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需要客观认识目前中国所处的现实发展阶段和真实的比较优势所在及其演变趋势。相反,如果不以现实条件和比较优势为基础,盲目求高追大,不仅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比较优势升级,反而有可能会丢掉既有的优势,丧失进一步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机遇,尤其是丧失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入演进所带来的新一轮发展机遇。甚至有可能发生国内学者所担忧的最糟糕情况:不以现实条件为基础的强行“升级”,有可能会在惊险的一跃中摔得“粉身碎骨”^②。

因此,必须从中国所处现实发展阶段和分工地位角度出发,探讨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实现

机制和战略调整。《机制与战略》一书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该书着重从出口商品“相对平均单位价值”“出口重叠指数”以及不同技术层面上的出口商品“相对平均单位价值”三个方面,基于跨国比较的视角,以出口技术复杂度为主要考量指标,对中国现有比较优势所决定的分工地位进行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总体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中低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一定差距。该书作者通过将精准测算的贸易附加值引入到传统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测度公式^③,发现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布局中的现实分工地位,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依托低端,挺进中端,遥望高端”。这一清醒而客观的认识,构成了探讨攀升全球价值链的前提和基础。

价值链攀升新战略应顺应国际分工演进新趋势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学术界发起了对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模式的反思和争论。学术界形成的共识是,开放发展仍然是实现中国经济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发展开放型经济,而是如何提高中国国际分工地位,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问题。^④也就是说,开放发展的模式需要转型。总的来看,我们仍然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是其内涵发生了深刻变化。以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为主要内容的开放发展,不能再简单因袭和重复传统的做法和老路,而是要发展更高水平、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这就需要研究经济全球化新形势的变化与发展,顺应国际分工演进的新趋势和新特征,逐步实现价值链的攀升。

很明显,若要顺利实现价值链攀升,不能脱离全球分工体系而“自说自话”,而应该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顺应并抓住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新趋势所带来的战略新机遇。这是因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模式、特点乃至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地位,不仅与自身条件和内在因素有关,也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的特征和趋势密切相关。在前一轮开放发展中,中国之所以能够将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挥到极致,不仅仅是因为分工模

式逐步向产品价值增值环节和阶段演化,从而在专业化领域不断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全球价值链分工还伴有要素跨境流动的突出特征,即前文所说的全球价值链本质是要素分工。中国以利用外资为主要载体的一揽子生产要素的引进,与自身大量闲置生产要素如优质低价劳动力相结合,充分释放和激发了潜在比较优势。试想,若不是资本等要素跨境流动性增强,中国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要素禀赋优势恐怕未必能够真正转化为现实比较优势,更可能成为一种隐性失业和闲置要素而难以进入生产领域。这就是顺应演进趋势而实现发展的理论逻辑。

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是否出现了新趋势和新特征?如果有,这些新趋势和新特征能否为中国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带来战略机遇?这是研究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理应解决的重要问题。《机制与战略》一书,对此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分析。该书作者指出,虽然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速度在放缓,但同时出现了一些新趋势和新变化,主要表现在全球价值链正从以往的生产制造过程向创新链分工拓展变化;从以往的制造业领域的环节和阶段分工向服务业领域的碎片化分工方向拓展变化;从传统的基于发达国家的全球创新战略向基于发展中国家的“逆向创新”战略变化;从传统经济规则向新一代全球经济规则方向演变等。全球价值链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变化无疑为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价值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带来了重要机遇。比如,在以往制造业基础之上向融入创新链领域拓展和延伸,有助于我们利用全球创新资源从而发展创新驱动的开放型经济;利用服务业“碎片化”的发展机遇,有助于推动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大发展;顺应并抓住“逆向创新”的发展趋势和机遇,有助于进一步集聚诸如研发等高端生产要素,奠定价值链攀升的优势要素基础;抓住新一轮全球经济规则形成的机遇,不仅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从而努力为进一步参与价值链分工改善环境,也可通过开放倒逼改革从而为价值链攀升奠定制度保障。总之,正确判断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趋势及其战

略机遇,对于科学制定和实施全球价值链攀升策略至关重要。

攀升全球价值链应有新思路和新战略

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和采取科学有效的对策举措,有助于加快攀升全球价值链。在明确中国所处现实发展阶段和现有比较优势以及全球价值链分工演进新趋势基础上,究竟采取怎样的发展战略和攀升策略,才能有效助推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是目前理论和实践部门关注的紧要问题。

众所周知,决定和影响一国分工地位及其变化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既有宏观的,也有中观的和微观的,还有体制机制等方面的。针对中国如何实现全球价值链攀升问题,学术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有学者认为,在要素跨国流动性不断增强背景下,要素国际合作型专业化成为当前全球经济运行的基本机制,决定一国分工地位高低的关键因素在于要素质量,因而提升劳动力素质,努力培养本土高级要素,是促进价值链攀升的关键所在。一些学者关注到了生产者服务业,尤其是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对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进而提出通过大力发展高端生产者服务业,助推中国攀升价值链。还有学者提出通过构建国内价值链,从而突破发达国家对全球价值链封锁,实现价值链攀升。^⑤这些思路,对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无疑具有实际价值。但是现有研究大多没有充分考虑中国所处现实发展阶段,一味强调“应该”怎么做,对“能做什么”考虑不够,也没有将价值链分工演进新趋势纳入分析框架。

《机制与战略》一书认为,中国所处现实发展阶段及比较优势表明,中国仍然存在大量低技能劳动力,传统制造业在整个产业体系中仍然占有较高比重。基于这一现实,价值链攀升不能简单狭隘地理解为一味攀升“微笑曲线”的两侧高端。何况,“高端”未必意味着高附加值和高利润,“低端”也未必就一定是低附加值和低利润。因此,价值链攀升及其战略调整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传统产业和原有低端环节阶段的转型升级,即在原有专业化领域进一步做绝、做透、做细、做精,

通过精细化和生产率提升而夯实竞争优势；二是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高端领域进军。而无论是传统产业领域的转型升级，还是向高端产业领域的拓展，都应该在把握价值链分工演进新趋势的战略机遇中推进。正是基于上述着眼点，《机制与战略》一书强调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应基于现实条件，顺应新趋势，抓住新机遇，采取反映阶段性特征的针对性对策举措。就具体的战略调整而言，应当从以往简单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向充分利用扩内需战略的新机遇以增创参与价值链分工新优势转变；从依托主要源于人口红利的传统低成本竞争策略向依托制度变革红利的战略取向转变；从以往的“重出口”向进出口并重，进而充分发挥进口促进产业升级和价值链分工地位重要作用的发展战略转变；从以往主要以制造业开放的“单兵突进”发展战略向扩大服务业开放的全方位发展战略转变；从以往简单“引进来”的单向发展战略向更高水平“引进来”和更大步伐“走出去”并重的双向循环系统构建战略转变。为了进一步明晰上述战略转变和调整对价值链攀升的作用，《机制与战略》一书分别从充分利用本土市场规模效应、提升集聚先进生产要素能力、“走出去”整合和利用全球优质要素、加快推进国内改革以及进一步推

动贸易尤其是进口自由化等方面，系统分析了上述新战略对价值链攀升的内在作用机制。换言之，该书作者提出的战略调整新思路和新对策，不仅从现实条件出发并顺应了价值链演进新趋势，更是建立在严谨的作用机制理论分析基础之上，并辅以了必要的经验证据。作者的分析既吸收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又进行了综合和发展，因而更具现实针对性和实际价值。

- ① Hausmann, R., and B. Klinger,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Patter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Product Space, *CID Working Paper*, Harvard University, 2006.
- ② 张其仔：《比较优势的演化与中国产业升级路径的选择》，《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9期。
- ③ 戴翔：《中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基于贸易附加值的测算》，《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1期。
- ④ 隆国强：《把开放发展推向新高度》，《人民日报》2016年8月10日。
- ⑤ 张少军：《国内价值链是否对接了全球价值链——基于联立方程模型的经验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3年第2期。

作者简介：张二震，1953年生，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战绍磊〕